

教案 16-《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

一：教学目标：

1. 了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
2. 理解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
3. 掌握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的正确方向与原则。

二： 教学重点

1. 了解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
2. 了解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

三： 教学难点

1. 能够理解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2. 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

四： 教学时数： 90 分钟

五： 教学用具： 多媒体播放器， 课件、 相关辅助教学材料

六： 教学过程及内容

1. 教学资料及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理解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掌握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的正确方向与原则。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一、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

二、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

第二节 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

一、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

二、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

三、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

第三节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

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魏晋时，它吸收老、庄，形成玄学；宋明时，又吸收佛学，形成理学，等等。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它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超出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其基本精神和特点没有改变，也没有发生过危机。

在长期封建社会历史上，汉民族曾经历过几次严重的民族危机，例如，蒙古族推翻南宋政权，建立元朝；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民族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但是，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文化危机感。以明清之际来说，当时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清朝初年，站在汉民族立场上，认为明清间的鼎革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他们并且从文化上探寻明朝灭亡的原因，指出明朝实际上是亡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理学末流，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对儒家文化产生危机感。相反，他们认为，明末之所以学风空疏，是因为丧失了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要纠正这种弊端，只要恢复经世致用的精神就可以了。这就是说，他们对于儒家文化仍然笃信不疑，认为文化方面出现的问题，总可以在传统文化的范围中调整解决。

儒家文化的这种稳定性，源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在鸦片战争以前，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没有受到过有力的冲击，更没有从内部发生动摇，因此作为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反映的传统文化就不会发生危机。

鸦片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

爆发于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同于以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已经在世界上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主义体系，鸦片战争就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一次殖民主义战争。由此而引起的中华民族的危机是极为深刻的：中华民族不仅遇到了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亡天下”的民族危机，而且遇到了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体的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危机的危机。

从广义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危机。

从鸦片战争开始，“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向“坚持农业和官僚政治的中国”发起全面挑战。就形式来说，有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而所有这些形式的挑战实际上都包含着西方的价值观向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的挑战，由此就引起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也就是传统文化的危机。

出现了危机，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已不可能按照原来的轨道来进行，因为客观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逐步遭到破坏，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也随之发生动摇。而作为封建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反过来为之服务的传统文化，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和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这就迫使传统文化不能不革新，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新的经济成分即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逐渐发展和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不断成长的新形势，这样，传统文化就向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方向转化了。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西方文化也随之涌入。西方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它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出即野蛮又先进

的双重性格。当这种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时，就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弱点和弊端，这就迫使传统文化不能不向西方文化学习，因为按照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总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学习。于是，中国文化就开始摆脱以往的隔绝状态而走向世界了。

因此，可以说，鸦片战争所引起的文化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重要契机。

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

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认识，正规地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了解得极少。以林则徐为例，他在奉旨到广州查禁鸦片时，连英国、美国的地理位置都不清楚。他还沿袭以往的谬说，认为西方“夷人”习惯吃牛羊肉磨的肉粉，必须饮服中国的茶和大黄来“消食”。林则徐是一位著名的讲求经世致用的封疆大吏，但是，作为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泱泱大国的封疆大吏，他（以及他的同僚和道光皇帝）所关注的只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及边疆事务，而不关心、似乎也没有必要关心遥远的外国事物。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不同了，因为这场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并成为其附庸，这就迫使中国人不能不关心资本主义世界的事物了。

当1839年春天，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走私时，他才开始认真研究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他组织人员搜集有关英国的情报，并主持编译了《四洲志》。这部书是根据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译的，它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情、风俗。这部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它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起点，而林则徐则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继林则徐之后，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一百卷，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史地著作。此外，姚莹写成《康辅纪行》，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枬写成《海国四说》，等等。这些著作，有的是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的是关于中外关系的，它们表现出近代中国人最初的世界意识。

魏源等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从其所接触到的西方文明中，敏锐地认识到西方有自己的文明体系，不可以“夷狄”视之。魏源指出：在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德、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海奇士、域外良友，不可称为“夷狄”。他将“夷狄”的概念重新作了解释，不再简单地以国界和种族来区分是否为“夷狄”，而以文明发展的程度来区分。这虽然不科学，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摆脱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而以一种健康的民族心理去对待其他民族。一旦有了这样的态度，也就容易发现其他民族的长处，产生学习其他民族长处的愿望，就有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要求了。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所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坚船利炮，因此最初所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意向也主要是仿造船炮。据统计，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有六十多个大臣建议仿造船炮，道光皇帝也多次发布谕令，于是清廷上下掀起一阵仿造船炮的热潮，虽然为时不长。“天朝上国”的皇帝，过去是看不起“西夷”的，这时却不得不承认“西夷”的船炮比中国的厉害，并谕令仿造，这是一种观念的重大转变。但是很遗憾，道光没能再前进一步，把仿造船炮上升为学习西方的一般原则而使其具有普遍意义。

倒是学者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从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的要求中，概括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提出了比较系统

的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科学技术的具体主张。他建议：一、建立造船厂和火器厂，聘请法国人和美国人当指导，仿造西洋船舰火器，以及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礮、千斤秤等各种民用器具。二、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水师科，对于能制造西洋船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授予科甲出身。魏源的建议具有离经叛道的意味：聘用外人，仿制洋器，这背离了“用夏变夷”的传统，而堕入“用夷变夏”的“歧途”；掌握制造技术的工匠可以获得科甲出身，这违背了儒家“重政轻艺”、“重本轻末”的传统，破坏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因此，当时就有人批评“师夷长技”的建议是过于“失体”了。

但是，魏源“师夷长技”的主张却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 19 世纪 40 年代先进的中国人从中西文化的最初撞击中，破天荒地发现了在至高至善至美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不足，而一向被认为粗鄙的“夷人”却有某些“长技”，传统文化的不足正需要用“夷技”来弥补和纠正。这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观念的变化，它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会，开始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

近代的动因

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而成的，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但是到了近代，经过不到一百年时间，它就大体上转变成为近代型文化。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转型呢？

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非常强调西方文化“冲击”的作用，他们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部缺乏活力的惰性体系，它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这个理论模式通常称作“冲击——反应”论。如果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寻中国文化转型的原因，那么这个理论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容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中发展的，它虽然没有停滞不前，但却发展缓慢，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这显然是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从“师夷长技”开始的物质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到制度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再到心理层面文化的近代化，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冲击——反应”理论正是肯定了这个事实，肯定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在促成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过程中的历史性作用。

但是，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它只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消极阻碍作用，而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它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和动因。

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当西方文化涌来时，它常表现出相当顽固的拒斥态度。但是它并不是只有拒斥的一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沟通、相衔接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富有活力的，它们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富有活力的因素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经世思想

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时就提倡一种

积极用世的精神，后世儒家继承了这种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修身”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中，经世精神也有强弱显隐的不同。以清代为例，清朝初年学风朴实，富于经世精神；中期，乾隆、嘉庆时，由于统治阶级严厉箝制言论，知识分子只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故纸堆中，致使经世精神隐而不彰；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经衰落，统治阶级对社会舆论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社会问题丛生，于是经世思想再次抬头，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著名学者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封疆大吏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都是讲究经世学问的。他们致力于研究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稍晚一些，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讲究经世之学。在经世思想的支配下，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曾国藩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对于魏源、曾国藩等人来说，把研究中国的实学扩大到研究西方的实学，乃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

二、变易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变易思想。儒家经典之一《易经》就是一部专门讲“变易”哲学的著作，它通过八卦推演，阐明了万物都是在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道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近代中国人在鼓吹改革、变法时常常引用古代变易思想作为根据。例如，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说：“孔子圣之时者也，于四代之制，斟酌损益，各得其宜，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轮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康有为则把《易经》中“穷变通久”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他说：“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中国传统变易思想成了他“变法”的理论根据。维新派还把传统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康有为的“三世”说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在他的那部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中，也可以看到中西变易进化思想的奇妙结合。

三、民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仅以儒家而言，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一直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严厉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同时，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使之具有了某些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包括向资产阶级转变的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例如，康有为在解释孟子“民贵君轻”的“微言大义”时说：“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民众之所公举，即为民众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照此说，君主不是什么“天子”，而是民众的一员；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民众赋予的；君主不是民众的主人，而是民众的仆人，君主是受民众的委托、受民众的聘雇而为民众服务的。康有为的解释很明显地受到了黄宗羲的影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指出：君主产生于处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因此，“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

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尽量利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来为排满革命服务。孙中山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众所周知，还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一翼的国粹派，在这方面也很突出，他们很推崇古代那些有异端思想的“在野君子”，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刘师培在《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就曾广泛地援引这些学者的言论，阐发其中的民主因素，宣传主权在民和法治思想。这本写于1903年的五万余言的小册子流传很广，刘师培也因之被誉为“东方卢梭”。经过国粹派的阐发，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在20世纪初年得到了发扬，它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中国文化从殷周时起就是一个融会了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与欧洲中世纪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具有涵摄性和包容性。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在近代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代从西方传人的各种先进思想，如科技思想、民主思想，以及五四以后传人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到接洽点，被吸收到不断发展更新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去，这是西方先进文化能够在中国传播、生根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几点，此外，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等也都极有意义，在近代文化变革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或有重要发展。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活力因素，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起着联结新旧文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的新文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先进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是促使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但是必须看到，它们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前已指出，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土壤之中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不再是原始的萌芽状态，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逐步发展，资产阶级随之产生并逐渐成长，它要求创造和发展为它服务的新文化，这就使传统文化产生了危机，并不得不向近代转型。

但是，中国近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挽救民族危机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内容，它的特点，也都是由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服务的。

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而倡导学习西方科技。光绪皇帝搞戊戌变法也是出于这种目的。当变法失败时，慈禧太后把他幽囚在瀛台，声色俱厉地质问他为什么要“变乱祖宗成法”，他战战兢兢地答道：“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行新法。”在慌乱中，光绪仍然简捷地说明了救亡图存和变法的关系。孙中山在谈到20世纪初年的革命风潮时说：“革命的这种风潮，是欧美近来传进中国的。中国人感受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国来

革命。”也说明是为救亡才输入革命思想的。

一代代志士仁人，都是围绕着挽救民族危机这个主题，苦苦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到“马克思主义”，种种选择，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内容的选择，并且决定了如何改造它们。以输入的西学为例，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进化论。所谓进化论，就是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以生存竞争说来解释人类社会，是一种为殖民者扩张服务的反动理论。但是一传入中国，却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它增强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为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再如自由学说，在西方是讲基于个人财产基础上的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力，而在中国则主要是讲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自由解放。这显然是由于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民族的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宜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相反倒要强调个人服从、个人牺牲。因此，在近代中国，个人自由权力的观念一直很淡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意识曾流行一时，但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高潮中了。

中国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也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大约每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即20-30年间，中国就要更迭和流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19世纪60-90年代，主要是求强求富的洋务思潮；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年，主要是要求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潮；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主要是追求个性解决的思潮，但为时不久，马克思主义就取代它而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如上所述，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对中西文化内容的选择和改造，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因此它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根本动力，与它相比，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还是次要原因。

近代文化论争

在中国近代，围绕着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包括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发生过多次文化论争。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或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等。

“中体西用”论是鸦片战争之后就出现的一种观点，流行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而二者的关系，前者为“用”，后者为“体”，“用”是为“体”服务的。早期维新派薛福成对此说得很清楚：“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针在洋务运动时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那时洋务派是主张变革的，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顽固派根本拒绝西学，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只有“中体西用”的口号下才有可能部分地引进西学。

“中体西用”论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在于它开始破坏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儒学的基本体系就是孔子说的“修己安人”，即所谓“内圣外王”。

“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自我道德人格，其具体步骤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

开来，以达到“治人”、“安人”的目的，其具体步骤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是“治身心”之学，“外王”是“治世事”之学。在“内圣外王”的结构中，“内圣”是前提，“外王”是目的，只有先完成“内圣”，才能推及而实现“外王”。“内圣”和“外王”的这种关系也可以用“体”和“用”这对范畴来说明。明末清初学者李颐说：“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内圣”和“外王”即体和用的关系，二者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内圣”修养和“外王”事功都是通过研究儒家经典来实现的，二者即统一在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这就是所谓“通经致用”；第二，通过“修己”即“成德成圣”自然就可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效，即所谓“明体达用”。

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承袭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而来的，但二者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曾这样解释“中体”和“西用”的关系：“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一，“内圣”的“修己”和“外王”的“事功”已不可能都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来实现，“修己”过“中学”来实现，“事功”则要通过“西学”来实现，换言之，“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第二，由于中学只能“治身心”，而不能“治世事”，因此，“修己成圣”已不可能自然地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也就是说，“明体”已不能完全“达用”。这样一来，儒家经典已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性，儒学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就遭到了破坏，而不得不把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引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中体西用”论的进步性是有限的。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入第二个层面——制度层面，它要求改变封建制度，改变传统文化的“体”——三纲五常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中体西用”论正是要维护这个“体”，因此它就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严重阻力。

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就已不再是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了，而成为一股逆流，不断遭到批判。但它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大，还不时兴起波澜，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东方文化派”，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实质上都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者。

“中国本位文化”论正式提出是在1935年1月。当时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这种理论。“本位文化”论的核心观点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就是建设新文化的依据，也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准则。究竟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宣言》的作者写道：“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应该的，但当吸收其所当吸收……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从抽象原则上说，“中国本位文化”的提法并不错，它主张以中国现实需要为标准来取舍中西文化，超越了“中”、“西”、“体”、“用”之争。但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理论和原则的抽象阐述，而在于如何具体判定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因为它关系到实际上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的问题。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本位文化派是这样回答的：现在西方世界有三套文化，即英美的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主义和苏俄的共产主义，而这三者均不合于中国国情，中国需要的是“第四套文化”。什么是“第四套文化”呢？《宣言》的后台陈立夫说：“将我国固有之道性智能

从根救起，对西方发明之物质科学迎头赶上’二语，实足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方针也。”这一方针原来就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在这种文化建构中，没有给民主主义留下任何地位，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云云，说穿了，不过是适应蒋介石的文化统治政策的需要罢了。

对于“本位文化”论的实质，当时胡适看得比较清楚。他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过是“中体西用”论“最新式的化妆”。他讥讽地写道：《宣言》的作者们把“中国本位”解释为“此时此地的需要”，而何健、陈济棠等军阀，一面从西方购买“最新模特儿”的飞机大炮，一面又在提倡“读经祀孔”，这也正是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而建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胡适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他在1929年首次使用“全盘西化”这个词来表达他的文化观点，到30年代，又声明放弃这种提法，因为“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所以改为“充分世界化”，其实这两个词在胡适和其他西化论者那里是通用的，谁也没有把“全盘西化”硬性地解释为“百分之百西化”。

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主要是针对20-3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等文化保守主义派别而提出来的，它具有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积极意义。它在理论上的合理因素主要是分析了文化的整合性，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性。

胡适在论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时指出：凡是一种文明必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因子”，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人类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胡适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是建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筑在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要想在物质文明方面仿效西方，就必须在精神文明方面也仿效西方，即不但在“机械”上，而且在“政治社会道德”上仿效西方。这里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热烈追求。

但是，“全盘西化”论者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整合性，把它看成是机械的统一。另一位“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说：“文化本身是分开不得，所以它所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设使因为内部或外来的势力冲动或变更任何一方面，则他方面也受其影响，他并不像一间屋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种系统，而他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这就是说，要接受西方文化就必须全盘接受，不能有所区分和选择。这种机械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也不符合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实际。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是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并没有全盘西化；不仅中国如此，日本、印度等国家也是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都没有全盘西化。诚然，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但它们也不是完全同步发展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文明）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反过来给予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巨大影响。因此，人类文化的发展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主要表现为物质文化的进步，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则主要表现为精神文化的进步，二者表现为辩证的、动态的统一，而不是机械的、静态的统一。在两个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时，一个民族总是根据自己物质文明发展的水平去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于是就表现出文化的选择性来。在古代，印度佛教传来时，中国和印度处于同样的物质文化

的发展水平上，因此中国就比较容易接受佛教。在近代，中西文化发生撞击时，中国和西方不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中国落后于西方，因此，中国首先认识到自己落后并需要吸收的是西方的物质文化，而当中国的近代物质文化有了一定基础时，才能进而认识和吸收西方的精神文化。这就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来，而不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排拒。

胡适鉴于“全盘西化”的提法有“语病”，而改用“充分世界化”。这表明他很重视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但是他在强调时代性时，却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在近代，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是时代文化的主潮；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尚处于“古典时代”，中国应该也必须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这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应该也必须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全面认同西方文化。一个独立的民族，它不仅具有人种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化学上的意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同民族的文化是难分轩轻的，它们均适应了各民族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民族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心理、民族习惯，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积而形成的，它们虽然也发生缓慢的变化，但具有不可割断的历史继承性。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共同创造的，从来没有中断过，也不是任何人、任何外来力量所能割断的。就是胡适本人，实际上也终生徜徉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并为整理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个事实对于“全盘西化”论者颇有讽刺意味。

民族的科学大众的文化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围绕“全盘西化”论和“本位文化”论的论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收获是关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1936 年 6 月，鲁迅和沈雁冰、冯雪峰商议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是一个发展新文学的口号，同样也具有一般的文化学意义。这里已谈到文学的民族性和大众性问题，鲁迅并且指出这个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稍后，1937 年，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倡导“新启蒙运动”。他们明确主张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而这个新文化应该是以科学的方法即“唯物、客观、辩证、解析”的方法总结和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传统。并且提出：“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有些民族性。”这样，新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就更明确了。

1940 年 1 月，张闻天（洛甫）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并且说这四项是有机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也是在这年的 1 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说它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比较一下，毛泽东的提法比张闻天的少了一个“民主的”，不过毛泽东在解释“大众的”含义时，说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因此两人的提法实质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具体指出：所谓民族的，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为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首要任务——挽救民族危机、维护民族独立而服务。其实，这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根本任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就是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另一层含义是说，“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

特性”。这是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具有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又包括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文化交流中的民族主体意识。毛泽东对于后者特别作了详细论述。他写道：“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人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文化民族性的深刻内涵：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该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上，而且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主体性上，而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主体选择性上，而且表现在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上。也就是说，即使是外国的优秀文化，也不能完全照搬过来，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中国人自己的“消化”，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文化，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采取这种态度。

所谓科学的，一是说内容是科学的，一是说方法是科学的。内容是科学的，是说“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方法是科学的，主要是讲辩证的方法。为了具体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有的科学内容和科学方法，毛泽东特别讲了应该如何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两点：一是不能割断历史，二是必须批判地继承。前者和民族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后者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

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具有民主精神，而这种民主精神首先就表现在使人民群众享有文化权。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就将民主意识和群众观点统一起来。这一点对于发展新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因而文盲充斥的国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离开了这一点，新文化运动就失去了意义。

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新文化，大体就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但在很长时期中是不自觉的，在毛泽东提出了这个正确的方针以后，才指导新文化运动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但是，必须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抗日战争时期，而后则是解放战争，残酷的战争环境，严重地影响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不但如此，即使胡适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文化也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未能很好地完成，从而给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留下了一个严重课题。

5. 问题讨论

1. 评“中体西用”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6. 小结

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积极的活力因素，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起着联结新旧文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7: 思考及作业

1. 试析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高仕)